国家“211 工程”“十五”建设重点立项项目

考古与文物研究

主　编　李　丽
副主编　肖小勇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与文物研究 / **李丽主编**.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8
ISBN 978-7-81108-259-3

Ⅰ. **考**… Ⅱ. **李**… Ⅲ. ①**文物**—**考古**—**文集**②**文物**—**鉴定**—**文集** Ⅳ. K854.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8801 **号**

考古与文物研究

主　　编　**李　丽**
责任编辑　**凌　弘**
封面设计　**布拉格**
责任校对　**张　兰**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6. 875
字　　数　43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259-3
定　　价　35.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民族学社会学教材与研究丛书总序……（1）
办班记（代序）……（1）
黄河上游史前考古概述……（1）
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 ……（35）
匈奴考古发现及研究概况 ……（48）
晋侯墓地的发现与研究现状 ……（60）
从考古资料看唐宋时期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流 ……（77）
西夏王国与西夏瓷 ……（92）
隋唐雕塑……（105）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藏台湾少数民族
　文物及其民族学价值……（117）
西藏金铜造像艺术的演进……（125）
古代漆器发展简史……（146）
中国古代印玺……（175）
明清家具鉴赏……（212）
中国古代钱币与鉴定……（301）
中国古瓷……（490）

民族学社会学教材与研究丛书总序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 1952 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 世纪 80 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 世纪 90 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 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 56 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毕竟是一个自西方传来的学科，在中国发展历史较短，几十年来又多次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所以与我国一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中国的民族学无论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年轻、比较薄弱的学科。因此，今后本学科的重点是加强民族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建

设。为此，我们认为需要长期坚持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积极了解和借鉴国外学者有关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翻译、介绍国外一些经典的名著，又要随时掌握国外研究的动态，将其最新的代表性作品翻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和同行。

二、继承我院50年来的传统，坚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以中国的56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紧密联系实际，加强实地调查，以此为基础，进行理论的总结，为建立独树一帜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而努力。

我们认为有必要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并且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教材。因此，我们于2000年成立了“民族学教材与研究丛书编委会”，目的是以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为基础，系统地编辑出版民族学专业的教材和以实证性研究为主的专著、调查报告和论文。编委会将重点支持以下内容的教材和著作：

1. 民族学专业主干课和紧缺的必修课教材。
2. 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的专题研究著作。
3. 国外民族学名著或前沿理论与方法的译著。
4. 有重要学术资料价值且规范的田野调查报告。
5. 本院教师实证性研究的论文集。

我们要求教材的编写者，应具有多年讲授该课程的资历，并且发表过有关的研究论文。我们要求丛书中的教材和论著应参考并引用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我们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本套丛书能够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50年学术传统的发扬光大，为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和中国民族学在国际学术界中较高地位的确立做出贡献。

杨圣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办班记（代序）

这部教材是在我院文物博物馆专业研究生班所用讲义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其中包含了各位授课老师的心血，大多是老师们几十年研究的心得。这部教材的编写从研究生班创办之始即已启动，现在终于完成了最后的定稿与编排，即将问世，喜悦的同时，10 年来办班的坎坎坷坷、甜酸苦辣也再次涌上心头。

1996 年我们学院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为全国的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一批从事文物、博物馆和考古工作的高级人才，此项计划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称为该专业的研究生课程班。至今该班已举办了 7 期，所培养、毕业的学员达 400 余人。现在，这些毕业的学员都在全国各地的民族文物、博物馆和考古工作中大展身手，多数已成为该领域的栋梁。每当他们在工作中的捷报传来，我都会感到深深的欣慰。

那时候办这个研究生班的目的，一是为了完成国家文物局的委托，为民族文物工作培养人才；二是为了通过这项办学活动，加强我院的民族文物和博物馆专业的建设；第三则是为了“创收”。所谓“创收”者，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高校常用的一个词，就是自己想办法增加一些额外收入以补教育经费之不足。

我当时已任院长，虽然我们学院是当时学校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学科点，但拨给我们的经费却少得可怜，甚至比校内其他院、系的经费还要少。为了开展必要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我作为院长，必须想办法创收。于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最后经过与北京

大学文博学院竞争，得到了这份办班的创收机会。与北大文博学院相比，我们在文物考古方面的师资明显逊色，但我们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综合性知识，特别是在民族学角度的研究和积累处于全国高校中首席的地位。另外一个打动国家文物局领导之处的是我们办学的认真态度和诚心。为此，当时研究院的办公室副主任余梓东教授与我一起，不知跑了多少趟，去国家文物局介绍我们的办学计划、教学方案，具体到学员宿舍、师资来源、教材准备等几乎所有细节。我们的诚心终于打动了文物局领导，主管副局长彭卿云先生经过与我的多次深谈，决定由我们学院而不是北大文博学院来创办这个研究生班。能够得到这个机会，我还要感谢马沙老师，她多方说动自己在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读书时的老同学们，请他们在舆论上和授课时给予支持。

尽管在国家文物局内部，有人对我们能否办好这个班持怀疑态度，但我们终于接下了这份任务。记得开学典礼时，彭卿云局长亲临学院讲话祝贺，至今回想起当年的琐细往事，我仍然对彭局长的支持和信任满怀感谢与敬佩。同时也感谢在关键时刻仗义执言的宋兆麟教授，作为全国文物考古界的权威学者，他曾亲自找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介绍和推荐我们学院，并驳斥了有人对我们学院办学能力所造的谣言。

接下来就是一系列办学的具体事务。我们要自己解决学员的宿舍、教室等一切办学条件。记得我和马启成、白振声老师一起，在盛夏酷暑中骑着自行车到处寻找合适的房屋，问遍了学校周围几乎所有的旅社和出租的房屋，最后终于租下了学校博物馆后院的一排平房。那里原为几间仓库和办公室，年久失修，我们要自己去购买桌椅、床铺、褥子，粉刷墙壁，修理暖气、厕所，新建洗衣房，挂窗帘、门帘，还为学员们买了篮球、排球、羽毛球等体育用品。武小燕、马沙、戴成萍、冯秋菊、刘军、良警予、贺兰凤、马尔曼等人与我一起为此忙了一个暑假，为学员们

创造了一个安静整洁的居住环境。

第一期报名的学员共 80 人，经过考试，我们录取了其中的 38 人。他们来自新疆、西藏、海南、广西、内蒙古、甘肃、青海、吉林、福建、贵州、河南、黑龙江等省区。刚开学几天，就有学员由于听到一些谣言而对我们的研究生班产生了怀疑。记得一天深夜，戴成萍老师打来电话，说有人动员全体学员集体去国家文物局告状，说我们不具备办班条件，要求退学。情况紧急，而我当晚远离学校，来不及赶到现场，于是戴成萍老师与她丈夫（北京大学的李正孝教授）一起急忙驱车赶到学校，和班主任刘军老师一起，反复解释，劝阻了欲去国家文物局告状的学员。此类困难和误解以后还发生过多次。记得第二学年还未结束，有人提出要成倍地增加房租，否则就要把学员的铺盖扔出去。当时我又气又急，正不知如何处理，我们学院的分党委书记，性格刚烈的马启成教授站了出来，他说："谁敢不讲理，谁敢扔学生的铺盖，就打断他的腿。"把不讲理的人挡了回去。现在回想这历历往事，心中还感苦涩，同时也满怀感谢，感谢那些与我一起渡过难关的同事们。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们聘请了一批在全国文物博物馆和考古学界公认的一流学者任教。其中有史树青、单国强、孔祥星、李辉炳、叶佩兰、宋兆麟、周南全、李红军、董德义等人。这些人不仅在国内都属于顶尖级学者，有的在国际学术界也赫赫有名。由他们承担主要的专业课教学，很快就引起了轰动，不少外校和校内其他院系的学生也纷纷前来旁听，但教室座位有限，我们不得不在教室门口设岗，每次只允许 80 人进入教室听课。为了提高学员的外语水平，我们为该班 38 名学员聘请了 4 位英语老师，将学员划分成不同水平的小班授课。我自己也多次听课，与教员一起研究如何提高外语教学水平。第一届学员毕业时，外语通过率在北京高校的同类研究生班中排名第一，该班获得硕士

学位的比例也是同类研究生班中最高的，该班还有多人考取了博士研究生继续深造。国家文物局对这样的结果深感满意，多次向我们表示感谢。从 1997 年开始，我们就将每位老师讲课的内容经录音整理出来，又经老师们自己修改而编印成内部使用的教材。这些工作主要由马沙老师、戴成萍老师和我本人在一些学生协助下完成。

此后，为了创收，我们还在内蒙古、新疆创办研究生班。首要的问题就是招生。在新疆是与新疆职工大学联合办班。当年研究生班还是个新事物，特别是在边疆地区，人们对此全不知晓。新疆职工大学要求我们与他们一起去新疆几个城市边宣传边招生。于是我们利用暑假奔赴新疆，当时一起去的有白振声、戴成萍、张海洋老师，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已 70 余岁高龄的宋蜀华教授也与我们一同前往。我们相继到乌鲁木齐、吐鲁番、石河子、克拉玛依等城市做招生宣传，很快第一个 30 余名学员的班就开课了。但所有学员都是在职学习，而且住地太分散，无法完全集中在一个城市听课。于是我们就奔波于几个地方授课。有时一天驱车几百公里赶到另一个城市，稍事休息就去上课。记得那次我和白老师都因劳累而咽喉肿痛，但学员们集中一次不易，我是白天上课晚上打点滴，总算坚持了下来。在我们的努力下，新疆班最后办到了 100 多人的规模，多数学员都由于在研究生班提高了学历而得到职务职称的晋升，其中有多位晋升为厅级干部。

办班的社会效益是明显的，同时也为学院创收了资金。按学校的规定，研究生班学费收入的 40％归学校，其余的 60％用于办班的讲课费、管理费、教室租用费、教具课本等成本，再余下的就是学院的创收。

10 年来，我们为学校和学院创收了 100 余万元。我们用这些经费为学院购买了投影仪、幻灯机、录音机、电风扇、电暖气等设备，装修了会议室，为资料室购买了部分图书，为学院的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议室和每间办公室安装了空调（我们学院的办公室是全校各院系办公室中最早装上空调的），每年还用这些经费组织全院的各种学术和其他活动。例如 2002 年的院庆活动及数百人的学术会议，全院教职工每年几次的集体聚会和旅游，在年底给每位老师发一点奖金，给班主任一点补贴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2004 年，为了纪念我们学院的几位前辈学者，在我的提议下，从研究生班的创收费中拨出 18 万元，为潘光旦、林耀华、陈永龄、宋蜀华 4 位老先生设立了以他们 4 位命名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奖励基金，主要用于每年奖励学生和青年教师在学习和科研中有突出表现者。虽然钱不多，但每年评上此奖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们都深感荣耀。

现在，我们学院的经费比 10 年前已有了 10 倍以上的增长，应该说已比较充足。我们的研究生班仍在继续，其运作已走入正轨，我还在担任院长，但已不必如过去那样为办班操心了。其实，办班在高校中本是副业，对于一个院长和教授来说，没有人会将此视为你的政绩。10 年来，在中央民族大学，为办班花费如此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院长和教授中恐怕仅此一例。回想办班 10 年的辛苦，有时我也问自己，在正值个人学术研究的高峰期投入那么多时间、精力去办班，是否太不值得。但我仔细考量，觉得自己为此所做的牺牲应该都是有意义的。

佛教说人要积德行善，伊斯兰教说人要帮助别人，基督教说人要爱人，我不信教，但我是党员，党章上说要先公后私。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件有意义的好事。因为 10 年来，我们学院每一位教职工多少都从办班中得到了益处，学院的各项工作，特别是科研教学工作也明显从中得到了益处。这本教材的问世也再次表示了办班的价值。10 年办班的酸甜苦辣是值得的。

本书内容具体分工如下：

“黄河上游史前考古概述”，谢端琚；“中国文明起源的探

索”，严文明；“匈奴考古发现及研究概况”，乌恩；“晋侯墓地的发现与研究现状”，徐天进；“从考古资料看唐宋时期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流”、“西夏王国与西夏瓷”，马文宽；“隋唐雕塑”，齐东方；“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藏台湾少数民族文物及其民族学价值”，李丽；“西藏金铜造像艺术的演进”，陈庆英；“古代漆器发展简史”，张荣；“中国古代印玺”，罗伯健；“明清家具鉴赏”，胡德生；“中国古代钱币与鉴定”，董德义；“中国古瓷”，李红军。李丽博士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从联系作者到整理、编著及定稿，都亲历亲为，为本书的顺利付梓付出了许多辛劳。黄益飞同学也为本书的校对出力颇多。特向以上各位教授、研究员等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杨圣敏

2006 年 6 月 9 日

黄河上游史前考古概述

谢端琚

黄河上游地区包括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区，北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东邻陕西省，南接四川省，西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与西藏自治区为邻。该地区是我国内地通往中亚、西亚的必经之地，自古以来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黄河上游地区的河流两岸谷地和台地上都有发育良好的肥沃土地，加上水源丰富，交通方便，成为古代先民劳动、生息的场所。因此，我们的先民在这里便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古文化遗存。

一

黄河上游地区史前考古工作肇始于1920年，法国人桑志华（Pere E. Licent）在甘肃省庆阳县（今属华池县）城北赵家岔和辛家沟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文物。1923—1924年，瑞典学者安特生（J. G. Andersson）在该地区进行地质考察时，发现了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坪等古文化遗址多处。安特生在1925年出版的《甘肃考古记》中把甘肃古文化分为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和沙井六期。后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他错误地把齐家的年代排在仰韶之前，实际上仰韶文化要比齐家文化早。

安特生对黄河上游地区的考古有开创之功，但是他的观点是错误的。

20世纪40年代，裴文中、夏鼐先生等老一辈考古学专家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渭河、洮河等流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并且都有专著。例如，裴文中的《甘肃史前考古报告》和夏鼐的《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均是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他们所做的调查发掘工作和研究成果，为后人进一步开展该地区的考古研究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重视考古事业的发展，谱写了中国考古学的新篇章。20世纪五六十年代，配合国家的基本建设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195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组成了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1956年开始对甘肃省刘家峡水库区进行考古调查工作，刘家峡原属于永靖县，在兰州南部；考古队在刘家峡水库区范围内经过全面调查，共发现古文化遗址176处，包括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

在调查基础上，相继又发掘了几处文化内涵比较丰富的遗址，它们是永靖县范家村、马家湾、大何庄、秦魏家、张家嘴、姬家川等遗址，均属于刘家峡水库区内的文化遗址。这几处遗址出土的遗物属于史前时期的不同文化遗存：范家村和马家湾遗址属马家窑文化，大何庄和秦魏家遗址属于齐家文化，张家嘴和姬家川遗址属于辛店文化。这个时期在刘家峡水库区外，还发掘了武威皇娘娘台、兰州青岗岔和青海都兰县诺木洪等遗址。其中秦魏家遗址的发掘引人瞩目，如发现齐家文化墓葬138座，包括合葬墓24座。合葬墓以夫妻合葬为主，男性仰身直肢、女性侧身屈肢。这种葬式涉及女性的身份问题，曾引起学术界热烈讨论。发掘者认为墓里的女子是被迫殉死的，郭沫若先生在《对临夏遗迹合葬墓的一点说明》（《考古》1964年第8期）中提出，“由男

女合葬墓中的骸骨情况来看，很可能是女子自愿殉死的。女子屈肢，依附在男子的左肩，表示着依依不舍的情态”，指明这些女性不是被迫死的，而是自愿殉死。他的看法引起了考古界的广泛注意。所以，这个发现极为重要。它的发现对研究齐家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婚姻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不管这些女子是在哪种情况下死的，这种葬式已很形象地反映出当时的婚姻形态是一夫一妻制。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发掘工作做得较多，可以说是考古事业进入了繁荣时期。同期先后发掘了甘肃兰州曹家嘴、广河地巴坪、永昌鸳鸯池、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东乡林家、玉门火烧沟、永登蒋家坪、天水师赵村、西山坪和青海乐都柳湾、大通上孙家寨、民和核桃庄、阳山、循化阿哈特拉、湟中潘家梁以及宁夏海原菜园村等 10 多处遗址。其中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规模较大，揭露面积达 13700 多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房址 240 座，窖穴 342 个，墓葬 79 座，窑址 38 座，出土陶、石、骨器等 8000 余件。师赵村与西山坪遗址揭露面积 6895 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房址 39 座，窖穴 72 个，窑址 6 座，墓葬 27 座，出土陶、石、玉、骨器等 2000 余件。这里首次发现了秦安大地湾一期、仰韶、马家窑、齐家文化连续不断的地层叠压关系，从而揭示了黄河上游史前时期从早到晚的文化发展序列。乐都柳湾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墓葬共 1700 多座，这是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一处原始社会时期的公共墓地。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发掘出 1130 多座墓葬，这个墓地主要内涵是卡约、辛店文化的，也有马家窑的，最重要的发现是引人嘱目的舞蹈纹彩陶盆，盆外边饰有 3 组舞蹈纹，每组有 5 个人。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进行较大规模发掘的有甘肃省武山傅家门、青海西宁沈那、同德宗日等遗址。傅家门遗址发现史前时期房址 11 座，窖穴 15 个，墓葬 2 座，出土石、骨、陶器等文物

约 800 件，包括马家窑、齐家、辛店、寺洼文化等多种文化遗存，它对我国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宗日遗址发现有马家窑文化墓葬，随葬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舞蹈纹彩陶盆，盆外表绘有舞蹈纹 2 组，一组为 11 个人，一组是 13 个人。还有一个彩陶盆绘着两个人抬着一个圆形物，形象生动，寓意耐人寻味。

黄河上游地区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统计该地区经调查已发现史前文化遗址 3200 多处，已发掘的遗址 80 多处，发掘清理的墓葬 8000 多座，发表的调查、发掘简报、正式报告和论文等约 400 余篇。

二

黄河上游地区史前文化五彩缤纷，复杂多样。有哪些史前文化呢？现在这里做个简要介绍。主要的有：大地湾一期文化、师赵村一期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诺木洪文化、沙井文化等 10 多种。下面依年代早晚顺序，分别论述。

大地湾一期文化　黄河上游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因首次在甘肃省秦安县邵店村大地湾遗址发现而命名。主要分布在渭河中上游地区，经发掘的有大地湾和天水西山坪等遗址。发现有半地穴式房址和圆形或椭圆形窖穴。当时居民经营农业，经发掘出土有黍和油菜等炭化十字花科的植物种子，推知黍为当时居民的粮食，油菜为副食品。生产工具有石刀、斧、亚腰形石铲和打制石核、石叶等，不见穿孔器。葬俗流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单人仰身直肢葬，一般有少量陶器等随葬品。经营制陶业，有以夹细砂红褐陶、灰褐陶为特色的陶系。主要器类有圜底

钵、三足钵、圜足碗、杯、筒腹平底罐和筒腹三足罐等（图一）。以交错绳纹、波折形堆纹和红彩宽带纹为主要纹饰。大地湾遗址还发现彩绘符号 23 片，用红彩绘在陶钵内壁上，种类有“个”、“＜”、“W”等多种不同形式。这种符号可能具有记事或有某种寓意的功能。这是一项重要发现，对探讨古文字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年代为公元前 6220—前 5360 年。

师赵村一期文化　因首先在甘肃省天水市太京乡师赵村发现遗址而命名。其分布范围与大地湾一期文化大体相同，主要分布在渭河中上游地区。已发掘的遗址有天水师赵村与西山坪等遗址。发现有圆口锅形、口小底大袋形窖穴。经营农业，有梯形石斧、长方形石刀、带柄石杵和磨盘等生产工具。经营制陶业，陶器是当时的主要生活用具，器类有圜底钵、圈足碗、平底盆、圆腹三足罐、鹅蛋形三足罐和侈口深腹瓮等（图二）。纹饰有绳纹、划纹、锥刺纹、附加堆纹和红彩或黑彩宽带纹等，以黑彩宽带纹为主。其年代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而早于仰韶文化。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5300—前 4900 年。师赵村一期文化是新发现的文化遗存，填补了黄河上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中重要的一环，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仰韶文化　因首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遗址而得名。在黄河上游地区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地区。已发掘的遗址有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天水师赵村与西山坪等多处。发现有方形、长方形和圆形半地穴式房址及大型建筑物等。有众多的袋形和锅形窖穴。经营农业，出土大量的穿孔石刀、梯形石斧、锛、条形凿、石弹丸等生产工具。葬俗流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瓮棺葬等，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其次为二次葬，也有一定数量的合葬墓。较为特殊者，是在王家阴洼墓地发现在墓坑左侧还挖有一个放随葬品的椭圆形或圆角方形的土坑。

仰韶文化制陶业发达，据其内涵的差异，可分为半坡、庙底

沟等类型。半坡类型最富特征的陶器有圜底钵和盆、蒜头细颈壶、葫芦口尖底瓶、葫芦口平底瓶、大口尖底罐、折腹罐、鼓腹小平底瓮和鱼纹彩陶瓶等（图三）。纹饰有彩绘、绳纹、弦纹、锥刺纹和附加堆纹等，彩绘图案别具风格，纹样是以直线、斜线、直边三角、方块等组成的几何形花纹，还有鱼纹等像生性花纹，并且多属于写实性动物纹。庙底沟类型陶器的主要器类是曲腹碗、卷沿盆、双唇尖底瓶、深腹瓮、盆形甑和带有火门的陶灶等，还有双耳圜底钵、小口平底瓶、大口小底盘和轨状口深腹瓮等是很具有地区特征的器物。彩陶纹饰是以圆点、曲线、弧边三角形、月牙形等元素组成二方或四方连续的几何形图案，画面华丽。还有鸟纹、蛙纹等像生性花纹，形象生动。纹饰突出的特点是以曲线为主旋律，线条圆润流畅，与半坡类型彩陶以直线为主旋律迥然不同。半坡类型的年代要比庙底沟类型早，前者为公元前 4899—前 3819 年，后者为公元前 3999—前 3523 年。

马家窑文化　因首次发现在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而得名。这是在黄河上游地区最有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布范围广泛，在甘、宁、青境内的黄河及其支流渭河、洮河、湟水和西汉水等流域都有疏密不同的分布。经调查发现这时期的文化遗址共 2200 多处，已发掘的有甘肃东乡林家、天水师赵村、西山坪、武山傅家门、兰州白道沟坪、广河地巴坪、永昌鸳鸯池、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同德宗日、乐都柳湾、民和阳山和宁夏海原菜园村、曹洼等 30 多处。发现有圆形或方形的半地穴式房址，在林家遗址发现有吕字形房址，在门外附建一方形门斗，结构较为特殊。在房址周围往往有长方形窖穴和圆形袋状窖穴。经营农业，粟为主要农作物。有长方形穿孔石刀、凹背刀、齿刃刀、两侧缺口刀、斧、铲、磨棒和磨盘等生产工具。还有骨针、锥、笄、镞和石刃骨器等，石刃骨器的一侧或两侧挖有凹槽，在槽内嵌石片，这是很有地区特色的骨器。墓葬发现较多，已清理的墓葬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